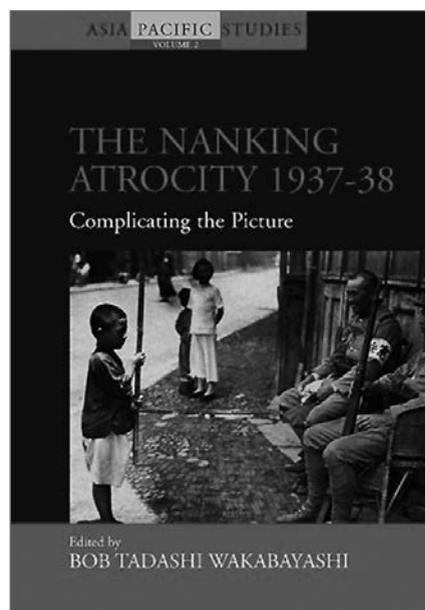


迷霧裏的歷史

——評 Bob T. Wakabayashi, ed., *The Nanking Atrocity, 1937-38: Complicating the Picture*

● 李 劫

《南京暴行》一書不僅可能推翻中日兩國學者既有的偏見，而且可能令華人學界和中國的普羅大眾由南京大屠殺出發，重新認識和思考何為歷史和真相、人類的道德觀、國際法、罪與罰等概念。



Bob T. Wakabayashi, ed., *The Nanking Atrocity, 1937-38: Complicating the Pictur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7).

一 關於本書

關於南京大屠殺，我們已經看過很多華人歷史學者的有關論述，無論他們來自中國大陸、港台或海

外，絕大多數都對該歷史事件深信不疑，對事件的分析和爭議主要集中在日本軍人所殺的南京市民總人數、殺人的方式，以及對南京大屠殺的總體評價，等等。相反，我們也從各種渠道（尤其來自中共官方）得知，有相當一部分日本學者對南京大屠殺持掩飾和否定的態度：有的拼命拉低日軍的殺人數字，對日軍的暴行輕描淡寫；有的乾脆把南京大屠殺說成是中國方面的責任；更有甚者，把南京大屠殺視為中國政府的一套反日宣傳，甚至是當時南京平民的一種幻覺，總之是傾盡全力地論證南京大屠殺與日本無關，或者是一件完全不存在的東西^①。

擺在筆者面前的這本名為《南京暴行，1937-1938：錯綜複雜的圖景》（*The Nanking Atrocity, 1937-38: Complicating the Picture*，以下簡稱《南京暴行》，引用只註頁碼）一書不僅可能推翻以上的偏見，而且可能令華人學界和中國的普羅大眾由南京大屠殺出發，重新認識和思考何為歷史和真相、人類的道德觀、國際法、罪與罰等概

念。該書作者除了三人為西方學者外，其餘包括主編若林正 (Bob T. Wakabayashi, 或譯若林忠志) 在內的八位作者全是日裔人士，他們絕大部分都任教於日本國內的大學 (頁 418-19)。該書所引用的一手資料不僅來自中國和西方，也有來自日本。資料的種類不僅有官方的，更多的則是源自民間，例如中國國民黨官員、日本士兵和當時駐守在南京的外國使節的日記和書信，等等 (頁 399-417)。

本書分五部分，除導言和後記外，分別有第一部分「戰爭罪行和懷疑」，第二部分「侵略者和通敵者」和第三部分「另一被否認的大屠殺？」。加拿大約克大學 (York University) 歷史學教授若林正在導言的一篇文章〈歷史事實的紊亂〉中對本書的寫作背景作了透徹的介紹。此文客觀地道出了有別於以往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正反兩種極端看法。例如，日本政府並不總是拒絕賠償，而是曾在不同的場合給予非正式的人道補償：日本政府在 1953 至 1954 年間給予台灣和意大利慰問金，作為對戰時被拘禁和殺害的外交官的補償；2003 年，中國的慰安婦獲准向亞洲女性基金 (Asian Women's Fund) 申請非官方的賠償；同年，日本政府更給予中國公民三億日元，作為曾經受到日本皇軍有毒催淚彈傷害的受害者的補償。關於南京慘案的傷亡人數，若林正認為並非全是日本人造成的，例如當時鎮守南京的國民黨總司令唐生智曾下令處死嘗試逃出南京的平民，而國民黨的掠奪行為也造成了戰時的大饑荒 (頁 12-13)。至於日本從未道歉的說

法也是錯誤的。文中引用中國《人民日報》一位記者的調查，指日本自 1972 年以來已道歉了二十一次。1982 年，日本政府曾改革教科書，從此教科書便出現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圖像和傷亡數字三十萬等內容，但文章同時又指出，日本的學校對教科書的使用有權作出自己的選擇 (頁 14-15)。

儘管南京大屠殺看似是一個歷史問題，但它至今已變得非常政治化，尤其在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若林正提醒讀者，中國政府利用南京大屠殺來實現以下目的：

第一，從中取得更多的援助來打造中國在亞洲的經濟霸主地位；第二，讓中國人民忘卻由於中國領導人濫權從而釀成的大躍進、大饑荒和文革的大災難；第三，緩和國內人民對因經濟發展不平衡而導致的貪污腐敗、人權和政治自由受踐踏、貧富懸殊的不滿；第四，轉移外國對中共對待西藏、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帝國主義式侵略和種族滅絕政策的批評。(頁 13)

關於對罪人和戰犯的看法，若林正認為中日雙方在這方面的認識有很大的差異：中國非常唾棄所謂的「漢奸」，例如國民黨的汪精衛和南宋的秦檜以及他們的妻子，這源於中國人的傳統信仰認為壞人在死後也不能變好，他們及其親人都應該永遠被辱罵。而日本的民間信仰則認為罪人在死後都是佛陀 (buddhas) 和神靈 (shinto spirits)，無需再受懲罰 (頁 13-14)。

南京大屠殺看似一個歷史問題，但它至今已變得非常政治化。若林正提醒讀者，中國政府利用南京大屠殺來實現以下目的：取得更多的援助來打造中國在亞洲的經濟霸主地位；讓人民忘卻由於中國領導人濫權而釀成的大災難。

若林正還透露本書的一些作者曾受到日本極端份子的書信、電郵和在公眾場合的威脅，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嚴肅和有建設性的探討仍然得以在本書中進行(頁10)。他指出編輯本書的目的是：「十位作者嘗試通過新的研究發現敏感而真誠地處理南京大屠殺的爭議。我們認為這次暴行是一種對法律和道德的羞恥侵犯，但我們同時又認為某些難解的事實與中國官方和西方的陳述有矛盾。」(頁19)他還寫道：

通讀本書，可見日本左派學者並不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只是從不同角度描述和分析事件，爭論主要集中在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的多寡、中日雙方對事件的責任分擔。他們都強調對歷史的研究要冷靜，絕不能感情用事。

理解日本人在南京做的事並非去寬恕他們的罪行，本書作者嘗試更準確澄清這些罪行的性質和程度，公正地找出罪行發生的原因和背景。我們承認日本人的侵略本性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同樣是事實的是，中國人也對南京的暴行負有一定的責任，但他們犯下的罪過〔與日本人相比〕輕得多，而且都是出自保家衛國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去重整，而非否認在南京事件上日本人的惡行、中國平民的受害，以及西方人士的人道主義行為。但我們試圖給出一個複雜的圖景，從而令到一些由日本否定派提出的令人不舒服的歷史事實更好地在南京事件上體現出來。我們意在呈現一個更可靠、更少煽情和更少歪曲的基礎，讓讀者對何為暴行和何為非暴行自行作出結論和道德上的判斷。(頁23-24)

若林正在本書的另一篇文章〈南京殺害百人大賽的爭論，1971-75〉中指出，根據對南京大屠殺的看法，日本學術界可以分為左右兩

派：左派一直堅持南京歷史上確曾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罪行；而右派則可細分為兩派：一為否定派，他們堅持認為根本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另一為淡化派，他們勉強承認在南京事件裏曾有中小規模的罪行發生，但認為這種「罪行」在任何戰爭中都會發生，無需特別對待(頁115-16)。

通讀本書，可見日本左派學者並不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只是從不同角度描述和分析事件，爭論主要集中在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的多寡、中日雙方對事件的責任分擔。最重要的是，他們都強調對歷史的研究要冷靜，絕不能感情用事。相反，否定派學者則是從懷疑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出發，指此事純屬子虛烏有，或者認為事件的發生完全是中國方面的責任。諷刺的是，否定派在歷史學上的這種「非黑即白」的態度，與目前中國大陸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官方歷史學者何其相似。

二 南京大屠殺的死亡數字

若林正在〈歷史事實的紊亂〉中談到南京大屠殺一直都是中國、日本和西方史學界的爭論焦點。在大屠殺的死亡數字上，中國政府在1983年宣稱超過三十萬，但並沒有清楚說明這三十萬中哪些是被屠殺的平民和在戰鬥中死亡的中國軍人。而日本右翼學者田中正文則指出當1937年12月南京淪陷時其人口只有不到三十萬，而在1938年3月其人口還在增加，所以這個死亡數

字是中國人用來誹謗和抹黑日本人民的(頁5)。

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副教授亞斯奇(David Askew)在〈數字方面的議題：人口統計學和平民受害者〉一文中採取了一個相對獨特的研究方法：通過大量查閱西方人士留下的記錄南京大屠殺的英文原始資料，並結合當時南京註冊人口的統計數據，為讀者展現出另一個觀察問題的視角。根據這些資料，作者得出結論：大屠殺期間中國平民(不包括從軍人員)的死亡人數由3,400至5,000不等(頁112)。

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比較文化研究教授笠原十九司(Kasahara Tokushi)在〈南京城外的大屠殺〉一文中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數字進行了重新調查和估算，反駁了某些日本學者只計算1937年12月13日淪陷前後在南京城牆內的死亡人數。作者指出，在南京周遭的鄉村小鎮的死亡人數比南京城牆內的還要多，而且日軍在南京城牆外殺了更多的中國平民和士兵(頁59)。他又

列舉了一些數據並指出，日軍在南京的很多搶奪和縱火行為與戰事無關，例如對平民的莊稼、農具、糧食和牲畜的搶劫，其實是為了作後勤補給(頁58)。作者最後的總結是：在整個「南京特別行政區」(Nanki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District)，包括南京城牆內外，中國軍隊總的死亡人數大約是8萬人，在南京城牆內約有5至6萬中國平民死亡；在南京特別行政區的郊外地段大約又有3萬平民死亡，而中國平民和士兵死亡總數大約在10至20萬之間(頁68)。

日本一橋大學日本史教授藤原彰(Fujiwara Akira)在〈南京罪行：一種解釋性的概述〉一文中除了對南京大屠殺的前因後果作了重新審視，也對日本否定派學者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死亡數字進行痛責，並在文末作出總結：「正如日本的保守的修正主義者所言，和平和奴性是可笑的，因為二戰對於日本而言是正義和光榮的。正是這種赤裸的政治邏輯鼓動這群修正主義者不斷否

若林正指出南京大屠殺一直都是中國、日本和西方史學界的爭論焦點。在大屠殺的死亡數字上，中國政府在1983年宣稱超過三十萬，但有日本右翼學者則認為這個死亡數字是中國人用來誹謗和抹黑日本人民的。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在卜正民的筆下，某些中國人積極地與日本人合作，例如為日本軍人安排合法的性服務等，這些行為雖然引起不少爭議，但無可否認其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平民的傷亡人數和受摧殘的程度。

認大屠殺的事實，而這正暴露其學術上的破產。」(頁53)

綜上所述，儘管日本學者對南京大屠殺的死亡數字爭論頗大，而且時有歪曲事實的數據，但其中不乏客觀嚴肅的論述。

三 通敵或合作？

來自牛津大學的中國現代史專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南京的中國通敵份子〉一文中考察了南京大屠殺期間由中國籍人員組成的南京自治委員會。在卜正民的筆下，某些中國人積極地與日本人合作，例如為日本軍人安排合法的性服務等(頁222)，這些行為雖然引起不少爭議，但無可否認其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平民的傷亡人數和受摧殘的程度。卜正民認為，「通敵並非一個經過太多思考的概念。它對於中國史學而言不具吸引力，中國史學讚美和給予那些抵抗者以特殊的榮譽，卻斥責通敵份子為道德不健全。」他又同時補充：「通敵也可理解為在大致上無法改變的情況下嘗試令他人和自己的生活變得可以容忍……在南京，就像在當時中國其他地區一樣，當日本軍事佔領成為生活的事實時，一些中國人確實進行了與新主子相互妥協的工作。即便大屠殺在上演，這些中國人的行為和抉擇都不能簡單地劃入英雄或受害者的範疇。」(頁198)

亞斯奇在〈南京被佔領期間的西方人士：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一文中調查了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守當地的由不同國籍的西方人

士所組成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Nanking Safety Zone)。亞斯奇認為在南京被佔領期間的西方人士曾抵抗日本人的殘酷行徑，例如照顧南京居民的衣食住行，幫助他們度過當時大屠殺的艱難(頁233-39)。

由此看來，「通敵」行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實在是迫不得已。表面上這種現象與中國文化相違背，但事實上卻暗中保護了更多人不受殘害，是合作多於通敵。

四 對日本戰爭罪行的裁決

卜正民在〈拉達賓諾德·巴爾評南京大屠殺：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和歷史的罪過〉一文中進行了一個案例研究，介紹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主持審判日本戰爭罪犯的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印度籍法官巴爾(Radhabinod Pal)與眾不同的看法。巴爾表達了對用來控訴日本戰爭罪行的證據之可靠性的懷疑，並拒絕宣判任何有關人士。他並非不認同南京慘案的真實性，只是不認同只有勝利者才有審判別人的權利，失敗者卻要被迫承擔罪過(頁150)。卜正民又寫道，東京國際軍事法庭是一個軍事上的特殊法庭，其法官都來自二戰中的戰勝國，職責是判決戰敗國的罪人：只有日本會被控訴其不當行為，也只有日本人的敵人才有權決定他們是否也在二戰中有不當行為。巴爾認為軍事法庭不應用法律和公義來掩飾其政治上的目的(頁159)。

巴爾質疑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全部成員的專業資歷和經驗是否適合

參與這項工作，因為即使他們都熟悉法律，但卻未必能有效地運用法律來裁決南京大屠殺一事，而且他們都沒有作為國際法專家的聲譽。巴爾特別指出其中一名中國籍法官的任命並非來自其法律專業上的能力，而是他對國民黨政府的忠誠，這就很難令到軍事法庭不會作出日本有罪的裁決(頁159-60)。巴爾還看到軍事法庭很容易接受那些未經證實的二三手證據，他擔心這些極度煽情的二三手證據只會有利於控方，認為「這些證人帶給了我們關於發生在南京大屠殺時令人齒寒的描述」，「但是在閱讀這些描述時，很難不令人懷疑其有歪曲和誇張成份」(頁160)。正如卜正民在文中所言：「對於巴爾而言，裁定日本人的戰爭罪行就等於屈服於整個訴訟程序的不公，將法律視為強者壓迫弱者的工具，從而變成對正義的嘲諷。」(頁162)巴爾的意圖並非不去控訴戰爭罪人，而是要堅持法律高於政治的信念。因為在巴爾看來，審判戰犯必須是一個純粹和公正的法律程序，不可用來作為政治報復之工具。

五 日本右派

來自日本福島的獨立學者小野健二(Ono Kenji)在〈幕府山附近的大屠殺〉一文中，通過大約二百位現定居於福島的二戰退伍軍人的採訪實錄，調查了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同樣來自福島的日軍第六十五軍團在1937年12月於南京北面的幕府山對手無寸鐵的中國囚犯進行

的大規模殺戮(頁70)。作者意圖反駁日本右派人士認為南京事件是一次「無可避免的自衛殺人」(頁73)，並在最後指出：「日本保守的修正主義者在幕府山事件上仍然堅持的一套聲名狼藉和自欺欺人的觀點，其動機與學術上的廉潔和史學研究上的真實全然不符。」(頁85)

笠原十九司是一位曾經受過日本右翼份子騷擾的學者，他在〈東中野修道：最後的否定〉一文中重點評論了日本的右翼學者東中野修道的種種行為。東中野曾組織了很多借學術為名、實為宣傳右翼思想的會議，例如在2000年1月23日舉辦的名為「對二十世紀最大謊言的批判：南京大屠殺」(頁309-10)。東中野又曾抓住任何來自中國方面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有瑕疵的照片、證據或文件，並聲稱它們是「捏造」的，以及是中國惡意反日計劃的一部分。他還認為，這些資料證實了中國政府和人民正與日本那些賣國求榮的歷史學家和教育工作者狼狽為奸，散布共產國際和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觀點，目的是通過這種宣傳戰來擊垮日本(頁318)。笠原認為更荒謬的是，中東野和另外一位右翼學者田中正明公然宣稱大概有二萬名中國國民黨人士假裝成日本士兵屠殺中國平民，並向外界報導這種屠殺是日本軍隊所為(頁322)。東中野甚至認為日本方面在當時與中國交戰無需遵守國際法，因為中國人是卑鄙和低等的存在物(頁324)。看來日本右翼人士的思想不僅體現在政治上的激進、對法律的無知和對學術的藐視，而且還上升到種族歧視的層面。

印度籍法官巴爾並非不認同南京慘案的真實性，只是不認同只有勝利者才有審判別人的權利，失敗者卻要被迫承擔罪過。他認為軍事法庭不應用法和公義來掩飾其政治上的目的。

六 當代日本國內對南京慘案的新認識

日本一橋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木村拓司 (Kimura Takuji) 在〈南京：當代日本的否認與贖罪〉一文中評論和分析了當今日本左派的社會運動對日本社會重新評價南京大屠殺的貢獻。1984年，日本出現了由一群左翼歷史學家和新聞工作者組成的南京社。南京社的成立基於其成員深切地感受到一股歷史的危機感、國際上的壓力和抗議，以及日本國內保守派有意在南京事件上重新鼓吹二戰時的宣傳。南京社不僅令部分日本人信服地接受南京大屠殺確實存在，而且為中國的受害者發起了民間的教育和賠償運動。南京社的努力令日本政府的態度在短短十五年間出現巨大的變化，例如，1990年代被日本文部省批准在學校使用的教科書亦包含了南京慘案和其他令人反感的戰爭罪行等內容；1998年12月和1999年4月，日本外交部和日本前官房長官野中廣務都前所未有地表態承認南京大屠殺的發生 (頁332)。南京社的成員有兩大目標：第一，他們希望從各種學術看法中客觀地得出南京事件的事實真相，用以抗衡「錯覺」、「謊言」等說法和淡化派人士任意踐踏事實來為其宣傳服務；第二，他們還借助南京的歷史教訓來喚起日本人民對其在過去戰爭中的負罪感，從而促進中日之間真誠的友誼 (頁342)。

文中還舉了一個例子，一群日本公民曾在1986年5月到訪南京，並計劃在那裏種植五千棵樹用以紀

念大屠殺的受害者和建立中日友誼，據說這些日本公民「都為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而感到需承擔的重責和深深的悔恨」。作者認為事件表明正是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學術成果影響下，很多日本人才開始嚴肅認真地看待和譴責其祖父輩的戰爭罪行 (頁346)。

七 華人的立場

《南京暴行》一書的作者大多認為，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民因南京大屠殺和其他歷史恩怨而起的反日情緒和行動基本上為非自發，多出自中共政權一手策劃。來自加拿大約克大學的另一位歷史學者福格爾 (Joshua A. Fogel) 在〈南京慘劇和華人的歷史回憶〉一文中有一段深刻的分析：

為了保持這張戰略牌，中國政府已致力避免將南京事件在其民眾中爆發，以免危害有利可圖的日本合同。因為中國政府遠非一個民主政權，由此可以盡情行使這種特權。它利用上述事件來規限日本和顯示給中國人民其已在中日關係中取得優勢，不過中國政府從未動員群眾到了損害雙邊貿易的地步。為了更加有效，北京政權不得不去走鋼絲。它必須控制中國公眾只在一些合適的議題上反日，例如1980年代早期的教科書爭論…… (頁270)

而在海外的華人，按照福格爾的說法，由於長期身在異鄉並和祖國故土隔膜，他們急於尋找一種共

《南京暴行》一書的作者大多認為，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民因南京大屠殺和其他歷史恩怨而起的反日情緒和行動基本上為非自發，多出自中共政權一手策劃。

八 全書總結

同的華人身份，而南京大屠殺則正是最佳的資源。福格爾用身在美國的猶太人為例，因為他們很多人已經不懂其祖宗的語言、宗教和文化傳統，所以遠在大洋彼岸的以色列建國和二戰中德國對其的種族滅絕（the Holocaust）都成了當今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的身份認同（頁272）。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儘管美籍華人張純如的《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j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②一書受到華人世界的一致好評，但其煽情和誇大事實也在本書中受到了批評。美國懷俄明大學（University of Wyoming）的現代日本史助理教授山本昌弘（Masahiro Yamamoto）的文章〈關於兩個慘案的故事：對美國歷史學的嚴肅評估〉就張純如和《南京浩劫》作了深入評論，認為這本暢銷書的寫作並沒有遵循嚴格的學術標準，書中內容大多以圖像而非以分析和理據服人，而且張純如作為一位記者，其作品缺乏歷史學者的審慎和理智（頁289、293、300）。福格爾也在〈南京慘劇和華人的歷史回憶〉一文中對「張純如現象」作了獨到的分析。他認為張純如寫作《南京浩劫》的目的並非為了真誠地改變日本民眾的觀點——她對此其實知之甚少，而是要把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告知美國公眾，這也正是她把南京慘案中的傷亡數字說得比被美國原子彈轟炸的兩座日本城市的傷亡數字還高的原因。福格爾認為，張純如成功地引導和糾集西方傳媒集體地對抗日本，這恰恰是中國年輕一代身份認同的中心（頁283）。

筆者認為，《南京暴行》一書有三層意義：第一層是探討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第二層是研究何為歷史真相及其意義；第三層是追問人性、道德、罪與罰等概念。

首先，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南京大屠殺作為極其嚴肅的歷史事件卻成了一塊沒有言論自由的學術禁區，稍有一些不同於中共官方或民族主義的言論，例如認為死亡數字其實沒有那麼高，中國方面也需對南京大屠殺的發生負責，或把南京大屠殺比作中共發動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會立即被中共打壓或扣上「漢奸」的帽子。若林正在〈歷史事實的紊亂〉一文的註釋中提到，很多日本同行在中國發表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文章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被審查單位取消和刪節，例如笠原十九司一篇文章認為南京大屠殺死亡數字不足三十萬的觀點就被刪掉（頁25）。當然，這種情況也發生在日本，美國西密歇根州大學（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歷史學助理教授吉田俊（Takashi Yoshida）在〈南京慘案的戰時描述〉一文中指出，多年來日本政府的言論封鎖是令到很多日本人（尤其年輕一代）不知有南京大屠殺的原因（頁261）。可見只有言論自由的社會才能將真相交代，進而減少人類之間因無知而造成的誤會和仇恨。

南京大屠殺一事在中國大陸還被屢屢用作政治用途。在外交方面，中國政府自1972年與日本實現邦交正常化以來，不斷使用南京大

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南京大屠殺作為極其嚴肅的歷史事件卻成了一塊沒有言論自由的學術禁區，稍有一些不同於中共官方或民族主義的言論，都會立即被中共打壓或扣上「漢奸」的帽子。

邁入新世紀以來，中共更加利用南京大屠殺作為支撐和延續自己暴政的工具：南京大屠殺成為中共扶持的激進民族主義的一部分，成了大陸「憤青」反西方的口號之一。

屠殺作為談判的籌碼和隱形的威脅，向日本政府索求貸款和援助。不過，這些到手的好處卻很少能讓日本侵華的受害者及其家屬受惠。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共政權也在利用南京大屠殺來遏制日本，為其在亞洲和世界的未來超級大國地位掃清障礙。更有甚者，通過南京大屠殺，中共把自己塑造成曾受帝國主義迫害的弱者，藉此拒絕西方的民主自由政制，為其「中國特色」之專制獨裁作辯護。

在內政方面，中共利用南京大屠殺來掩飾自己曾經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罪行已是不爭的事實。邁入新世紀以來，中共更加利用南京大屠殺作為支撐和延續自己暴政的工具：南京大屠殺不幸地成為中共扶持的激進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它成了大陸「憤青」用來歇斯底里地反西方的口號之一，中共用其來填補現時眾人唾棄的共產主義留下的信仰真空。筆者認為，所有中國的愛國人士和南京大屠殺受害者的最大不幸或許並非日本政府的拒絕道歉和賠償，而是中共政權撈足了南京大屠殺的政治資本，卻很少負責任地代表國民向日本方面討回公道，以及捫心自問一下如何避免南京大屠殺式的慘劇再度發生在中華大地上。

同時，筆者也要在此指出，日本政府在南京大屠殺一事及其遺留的歷史問題上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至今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官方態度仍然令人憤怒。正如木村拓司在〈南京：當代日本的否認與贖罪〉一文中指出，其實是日本普羅大眾多年來的民間運動才迫使日本朝野

勉強地承認他們在二戰中所犯下的罪行。儘管1980和1990年代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都提及了南京大屠殺，但在新世紀以來卻出現了倒退：南京慘案在歷史教科書中被貶低或忽略，這種情況到了2003年才有所修正（頁349）。原因可能由於在左翼學者和公眾團體的努力下，日本民眾對其在七十多年前的戰爭罪責有清醒的認識。而1980年代至今的民間運動更推動了教育民眾和撥亂反正之作用（頁348-49）。

曾有一些西方學者，例如加拿大卑詩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歷史系教授拉利 (Diana Lary) 在〈戰爭與記憶：中國的戰時回憶〉一文中指出，與德國政府對曾是納粹受害者的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賠償了數十億計的美元相比，日本對中國則賠償甚少，而且賠償一事往往是中日兩國政府之間的政治磋商，作為個人的受害者沒有發言權^③。本書中的日本學者對此問題持不同看法。若林正在〈歷史事實的紊亂〉中指出，其實戰後日本已在很多方面對中國人民作了多次非正式的補償和無聲的道歉：日本政府曾自願提出給予中國三至六萬億日元的財政援助，以代替官方式的賠償，但中共最後拒絕了。無可否認，日本的商界也在此後曾提供大量的低息或無息貸款，幫助了中國的經濟起飛，以及工業發展、軍備、導彈和核武的建設，例如大阪居民的稅收曾幫助北京贏得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而日本也曾幫助中國在2003年將載人火箭送入太空。但中國領導人卻隱瞞

援助的來源，把這些說成是自己的功勞（頁11）。

在此，筆者想略略涉及一下到目前為止甚少有人談論的東方文化中的「面子」問題：德國人民和政府大膽地承認自己在二戰中犯下的非人罪行，這與他們的基督教傳統對「原罪」的深刻認識從而使其能夠毫不留情地公開懺悔有關。相反，正如以上若林正的描述，即便是道歉或賠償，日本政府總是希望以「非官方」或「間接」的方式進行，也確實與其東方儒教傳統中的愛「面子」息息相關。作為出於相同文化背景的中國人，正如我們對待大躍進和文革的曖昧態度一樣，或能體會日本人的這些行為。

例如本書中唯一一篇全部以原始資料呈現的文章——〈一位到南京服役的預備軍官的書信〉，記錄了一位名為天野三郎 (Amano Saburô) 的日本軍人在二戰時從故土日本到中國參戰期間寫給家人的部分書信。除了在書信中描述了戰爭的殘酷外，天野三郎也通過寫景抒情，表達了對祖國的懷念，隱晦地流露出厭戰情緒，對和平、寧靜生活的渴望（頁184）。

若林正在後記部分的文章〈遺留的問題〉總結了本書的目的：「通過整理和區分在南京慘案上遺留的問題，我們希望可以藉此避免對南京一事不加區分的否定和無條件的接受這兩種過錯。」（頁359）本書目的絕非要否定南京大屠殺和日本在二戰中犯下的罄竹難書的罪過。作者力圖避免不少華裔學者（包括中國大陸和海外）幾乎一面倒地把手頭指向日本的做法，他們嘗試作出多方面

的考查，找出不偏不倚、不受任何政治和主觀感情影響的事實和結果。

嚴肅的歷史學和法律學上的探討都不能有任何情緒上的發洩，更不能被任何政治和意識形態所操控。中日兩國人民在過去的南京大屠殺和今天的釣魚台島問題上的無謂爭吵應盡快停止，否則仇恨將一代傳一代。正如福格爾所言：「不能因為過去某個人犯下的罪行而由此賦予受害者及其後代以侮辱罪人的權利。受害人的身份並不意味着他就能被當作聖人看待。」（頁281）日本在南京和二戰中的罪行固然要接受歷史公正的審訊，但歷史也同樣不接受罔顧事實地對罪人進行不公正的報復。在歷史面前，失敗者和勝利者是平等的。

本書目的絕非要否定南京大屠殺和日本在二戰中犯下的罪過。作者力圖避免不少華裔學者幾乎一面倒地把手頭指向日本的做法，嘗試找出不偏不倚、不受任何政治和主觀感情影響的事實和結果。

註釋

- ① 參見〈日本眼中的南京大屠殺〉（2014年3月25日），騰訊網，<http://cul.qq.com/a/20131213/007026.htm>；〈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殺稱是20世紀最大謊言〉（2012年12月13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2-12/13/c_124088821.htm。
- ② 參見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Books, 1997)。
- ③ 參見 Diana Lary, "War and Remembering: Memories of China at War", in *Beyond Suffering: Recounting War in Modern China*, ed. James Flath and Norman Smith (Vancouver: UBC Press, 2011), 278。

李 劼 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學
博士研究生